

北京鸟类已达531种。这个数字背后，不只是越来越热闹的观鸟镜头，更是一座城市几十年积累、十多年调查、一次次公众发现与专家复核的结果。



▼北京密云水库鸟岛上的苍鹭。
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

当531种鸟类飞过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近日，北京迎来第44届“爱鸟周”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《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录(2026)》，其中鸟类达到531种，新增黑冠鸛、淡色崖沙燕、棕腹隼雕、红胸黑雁等4种。这意味着，在这座面积1.64万平方公里、占我国国土面积0.17%的城市里，鸟类物种数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/3。

在全国范围内，北京是鸟类物种最多的城市之一；在世界范围内，北京是生物多样性最

丰富的大都市之一。同时，北京还是少数可以做到每年精确更新鸟类种数的城市。

当531种鸟类飞过北京的天空时，“531”不只是一个数字，更是一座超大城市的自然家底。很多人好奇，这样一个数字，究竟是谁、如何数出来的？

的志愿者和邓文洪的研究生同时记录到的。百望山位于海淀区，地处太行山余脉与华北平原交汇处，每年春秋两季，上万只猛禽经过这里。在一座2000多万人口的都市上空有猛禽成群迁飞，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一幕。迄今为止，这里已累计记录到38种猛禽。

有些来自观鸟爱好者。今年新增的中华大仙鹳和棕腹仙鹳都是原本栖息在南方的鸟，被摄影爱好者在通州和大兴拍到。邓文洪分析，它们的出现可能与气候变暖有关。

“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、收集信息，多数新纪录是拍鸟爱好者发现的，也有我们自己调查中发现的。这是专业力量和公众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。”邓文洪说，北京是全国观鸟人群最活跃的城市之一。他曾对其他地方的同行骄傲地表示：“只要有一种新鸟到北京，基本上‘跑不掉’。”

对于北京的鸟类爱好者来说，这座城市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邓文洪分析，北京地处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关键节点，北边、西边有燕山和太行山余脉，平原、山地、河流、水库、湿地并存，在一座城市里压缩了相当丰富的生境类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北京这些年不断有新鸟出现，既有长期被忽略后重新被确认的，也有随着生态改善、迁徙监测加强而被看到的，还有一些可能与气候变化、分布扩展有关。

对于城市自然保护来说，鸟类名录不只是一个数字。

它对应的，是这座城市调查能力、识别能力、组织能力和保护能力的一次次推进。公众拓宽了“看见”的边界，科学程序守住了“确认”的门槛。两者一起，才把一份名录慢慢做厚，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态家底慢慢摸清。

有了台账，才知道哪些鸟稳定来，哪些只是偶见，哪些湿地更关键，哪些区域需要少打扰、少开发、少惊动，哪些物种值得更早介入保护……从“爱鸟”的情感层面出发，加上这本台账，保护有了更好的抓手。

越来越多飞鸟，正在成为北京城的一部分。人们仰望天空，看到一份日渐清晰的自然档案。

标准则是“尺”——邓文洪和团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。

一个重要背景是，在北京531种鸟类中，留鸟只有80多种，绝大多数是候鸟。北京位于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，是无数迁徙鸟类的中转站，大多数被记录在册的鸟，都是这座城市的“旅客”。

筛选标准的核心是“证据”二字。通过搜集2014年之后的各种北京鸟类记录信息，在诸多参考资料基础上进行筛选和确认。

邓文洪给记者展示，标准包括但不限于——新发现的物种必须有照片，没有照片原则上不录入；对于外来物种(逃逸、放生等)，如果有北京繁殖记录，进行录入，仅发现成功越冬则不录入；有迁徙行为、有照片的迷鸟进行录入，没有迁徙行为的，即使有照片也不录入(很可能是放生或者逃逸)……

“在确定新增一种鸟这件事上，照片、录音、标本、历史文献、迁徙规律、分类学变化、专家比对等，都非常重要。”邓文洪表示，一般认为得有北京地源性背景、有经纬度坐标、有清晰鸟类图片，三者结合才能确认一条有效记录。

证据收集之后，每次名录更新前，都要将收集到的新纪录提交委员会讨论投票，至少2/3以上的专家同意才能最终录入。如果资深专家有坚定的反对意见，即便多数人同意也会慎重考虑。

最终公布的北京鸟类名录，是由一张张照片、一段段鸟声录音、一条条样线上的脚印、一次次专家会议上的争论，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。它既是科学调查的成果，也是一座城市生态文明进步的刻度。

公众参与度高 一份越来越清晰的自然档案

从503到531，名录公布以来的5年，新增的28种鸟类，每一种背后都有故事。

有些来自专业团队。这次新增的棕腹隼雕发现于百望山，是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

长，成员涵盖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中国林科院、首都师范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、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机构的专家。

这个编审委员会中，既有鸟类专家，也有哺乳类、两栖爬行类等各方面专家。不过比较而言，鸟类最为复杂。当年，可确认的哺乳类、两栖爬行类加起来不到100种，但鸟类一下子就拿出了500多种的记录。

2021年，北京鸟类名录第一版对外公布，北京鸟类有503种。随后，按照计划，两年后的2023年公布了第二版，北京鸟类增加为515种。此后，北京鸟类名录实现了逐年更新，2024年第三版鸟类有519种，2025年第四版有527种。

调查方式多样 从“地毯式轰炸”到专项调查

在邓文洪看来，北京鸟类名录最重要的意义是，北京有了更系统、更稳定、更可重复的调查框架。

邓文洪说，从2011年开始收集、整理，到2021年北京市第一版政府名录正式发布，用了整整10年时间。这10年间，经过了大量的专业调查。

调查分为三条线，同时推进。第一条是常规调查。从2011年起，北京陆生野生动物调查，由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、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5家机构协同作战。

邓文洪管这叫“地毯式轰炸”。在北京1.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划出17个大样方，每个10公里见方、面积100平方公里，在每个样方中布设10条以上调查样线，每条长3至5公里。研究人员沿样线行走，记录沿途看到和听到的所有鸟类，春夏秋冬四季都走一遍。样方采用系统取样法选取，在地图上均匀打格子，选出代表不同地形地貌的方格，17个样方覆盖城市的面积，超过国家规定的不低于10%的标准。

邓文洪管这叫“地毯式轰炸”。在北京1.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划出17个大样方，每个10公里见方、面积100平方公里，在每个样方中布设10条以上调查样线，每条长3至5公里。研究人员沿样线行走，记录沿途看到和听到的所有鸟类，春夏秋冬四季都走一遍。样方采用系统取样法选取，在地图上均匀打格子，选出代表不同地形地貌的方格，17个样方覆盖城市的面积，超过国家规定的不低于10%的标准。

第二条是水鸟同步调查。这一调查同样从2011年开始，由邓文洪牵头。北京有47个经过认定的重要湿地，研究团队从中选出20多个，组织20多支队伍在同一天上午同时出发，各自负责一片湿地。“如果拉长时间，比如用一周来调查，鸟在湿地之间来回飞，数量就不准了。”

如今这项调查已制度化——邓文洪主持编写了《北京市水鸟同步调查技术规范》，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定，作为北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，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各开展三次调查。

第三条是专项调查。这项同样开始于2011年的调查，瞄准的是大样方无法覆盖的区域和物种。调查包括12个自然保护区的区域调查、11个专项物种调查等23个专项。其中，邓文洪负责百花山自然保护区和蒲洼自然保护区以及褐马鸡、勺鸡和褐头鹇等物种。

除样线调查外，团队还使用了触发式红外相机和声纹设备。红外相机全天候工作，有体温的动物经过即被拍下，尤其适合记录夜行性和隐蔽性强的物种；声纹设备则全天采集鸣叫声，回实验室比对鉴定。

这些调查方式，有效保障了鸟类名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。

筛选标准严格 “新增一种鸟”需要很高门槛

在“看见一只鸟”和“确认北京新增一种鸟”之间，还隔着很长一段路。

北京鸟类名录能一年年变长，不是因为门槛越来越低，而是因为调查底子越来越厚，公众记录越来越多，可供判断的证据链也越来越完整。

2021年《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首次发布前，仅鸟类部分，邓文洪收集到的“北京有记录鸟类”一度达到544种。但经过专家委员会三轮讨论，最终保留下来的只有503种。从一开始，立了很高的门槛。

如果说三条调查线是“网”，那么录入



▲水鸟在北京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的水面上觅食。
郭俊锋摄(人民视觉)



▲一只池鹭栖息在北京密云水库鸟岛上。
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

成果来之不易 几十年、几代人接力探寻

要理解北京鸟类名录为什么能到531种，得先有时钟往前拨。

1987年，北京自然博物馆蔡其侃先生编著的《北京鸟类志》记录北京鸟类344种，这是第一部系统记录北京鸟类的专著。

1991年，首都师范大学高武、陈卫编写的《北京脊椎动物检索表》，将这个数量增加到375种。

再往后，随着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光美主持编写的《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》不断更新，北京鸟类的记录数继续增加，2005年是416种，2011年是431种，2017年达到475种。

这条数字曲线，不仅是一本本书与研究报告接力向前，也是一代代调查者在北京山水间不断寻找鸟类的过程。

现已是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的高武对本报记者回忆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和同事、学生在松山、百花山等地一趟趟跑调查，夏天酷暑上山、冬天踏雪外出，背着水和粮食四处露宿，用“笨办法”走过北京大大小小的山区。正是在前人的成果和自己调查的基础上，才编出了《北京脊椎动物检索表》。

对于北京鸟类调查来说，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。那一年，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北京部分启动。

从那时起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邓文洪开始牵头北京鸟类名录相关工作。此前，他的主要研究地点在四川和东北，对北京鸟类没有做过系统研究。但15年过去，他对其中的山山水水、重要鸟类分布地点已了然于胸。采访中，记者提及多个新发现的物种，他抬头看向办公室悬挂的北京地形图，都能一口说出时间、地点和发现者的名字。

2021年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希望编制一份正式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，并邀请了19位专家组成编审委员会——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志刚担任主任，邓文洪任秘书

▲北归的白天鹅在北京昌平沙河水库暂栖。
史家民摄(人民视觉)

老外爱逛南锣鼓巷

吴杏雨 南彤霏

巷头糖人小铺吆喝声此起彼伏，驴打滚、糖葫芦摊前人头攒动；巷中相声曲艺表演精彩纷呈，采耳、手作小店依巷错落；巷尾文创商铺好物琳琅满目，国潮、非遗制品件件精巧……不少老外举着自拍杆，边走边拍，直播打卡，实时传递这里的浓浓烟火气。随着时令转暖，北京市东城区的南锣鼓巷里更加热闹。这条承载着700余年历史的老街，如今已成为外国游客体验京味文化、购买特色商品的热门去处。

糖葫芦摊前，德国姑娘玛琳举着一串红彤彤的糖葫芦拍照，“我从没吃过，很好奇它的味道。”来自法国的萨拉在文创店里为父母精心挑选了几只中式小茶杯，她

高兴地和笔者分享：“我们来北京之前就想好，要在这里买最有北京特色的礼物。”葡萄牙母女伊丽莎白、爱丽丝在采耳店门口驻足观望。在店员热情邀请下，伊丽莎白体验起这项传统技艺。结束后她竖起大拇指：“非常舒服！这里的人非常友好，我感到很安全。来中国一直是我的梦想，现实比梦想中更好。”

今年一季度，全国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.5万人次，同比上升29.3%。免签“朋友圈”持续扩容，离境退税“即买即退”政策落地……一系列便利举措让“中国游”“中国购”热度持续攀升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，感受古老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魅力。

为了迎接五湖四海的游客，南锣鼓巷的商户们做足了准备。爆肚店的小谢来店才4个月，已学会“要不要多加点麻酱”“要不要多放点辣”等常用英文表达。隔壁糖水铺的小王举着盛满紫红色果汁的玻璃杯，用英语热情吆喝：“先生、女士，你们要不要尝一点桑葚汁！”萨拉感慨道：“商家们很友好，大部分会说基础英语，沟通很方便。”

南锣鼓巷的魅力，不仅在于热闹的市井烟火，更在于深厚的历史底蕴。这条老街与元大都同期建成，是我国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。文化名家齐白石、茅盾都曾住附近胡同里居住，留下了

丰富的历史印记。1990年，南锣鼓巷被列入北京市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，正式开启系统性保护之路。

在保护与利用的探索过程中，南锣鼓巷也曾面临过度商业化、老城风貌保护压力等难题。2016年，东城区通过业态调整、关停违规经营店铺等举措，保护四合院原有风貌，改善原住民生活。近年来，东城区坚持“老城不能再拆”的原则，修缮整治南锣鼓巷四条胡同，守护老城传统风貌和历史肌理。

如今的主街两旁，东西各8条胡同整齐排列，元大都坊巷规制的鱼骨状格局保存完整。拐入雨儿胡同，齐白石旧居便在眼前，可探索《砖纹若鸟》等画作的天然之趣；走进菊儿胡同，南锣鼓巷演艺新空间旁，中国邮政南锣鼓巷主题邮局已然入驻，游客可以在观演之余，将胡同里的美好记忆装进信封寄往远方。印度尼西亚游客杰西卡一家专程前来旅游，她称赞道：“这里漂亮、干净、安全有序，历史感十足。”

一条南锣鼓巷，装着北京城的古老和生机。对于外国游客来说，一套茶具摆在家里，就能想起北京的历史底蕴；一口糕点送入嘴中，就能想起摊主热情的招呼。以物为媒，以心相交。南锣鼓巷见证着外国游客走进中国、购在中国、了解中国。